

宾福德的学术遗产

——当代中国考古学的视角

陈胜前 战世佳

(吉林大学 吉林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在考古学史上,美国著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Binford,L.R.)无疑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被认为是“新考古学”的开创者。纵观宾福德先生的学术历程,可以发现,贯穿在宾福德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线索就是:发展科学的考古学,发展人类学的考古学。他的方法也是围绕这条线索展开的,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他运用民族志的研究,包括行动主义的野外调查以及系统的狩猎采集者民族志材料的分析,去了解史前狩猎采集者遗址的结构、组织以及所涉及的人类行为方式。

关键词:宾福德 学术思想史 中国考古学 过程考古

中图分类号:K851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斯人已去,似到了可以总结其学术遗产的时候了。其实,早在1998年,宾福德(Binford, L. R.)曾经的同事、朋友,考古史家萨博洛夫(Sabloff, J. A.)就总结过他的学术遗产(intellectual legacy),将其最长久的贡献归于永远的乐观精神,认为这将激励后学不断前进^[1]。不过,这样“升华”的归纳似乎并不利于后学继承其学术遗产。在各种非正式的介绍中,也还有不少对宾福德学术成就的概括,但是系统的总结尚少见。按道理来说,要总结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学者的贡献,不仅需要全面把握这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充分了解他所在的学术背景及其发展变化。显然,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是美国考古学学者,也很难全面了解和总结宾福德的所有学术观点,遑论整个西方考古学的关联背景。所以,这项研究注定只能从某个视角来看,虽然不全面,甚至有偏颇,但可以提供一个纵贯的剖面,以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宾福德的学术精髓。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里的视角就是一种“他者的眼光”,从缺乏人类学与科学传统,以

及没有经历过程考古学发展阶段的中国考古学的视角来考察,那些在西方考古学中习以为常的东西,也会变得格外醒目,因此可能更有助于认识宾福德学术遗产的价值。其次,作为他的学生,从课堂内外,作者收获到许多在正式出版物中不会出现的信息。尽管宾福德的文风有名的晦涩,但他的课堂却是明白晓畅的。这些细致入微的解释是他的同行们无从知晓的。最后,作为年轻一代,而不是他的同辈,也许能从更开放的视角、更包容的态度来看待其成就。在面对后过程考古学的批评时,也更能以相对公正的立场对待。当然,这两点还谈不上是视角,而是研究的某种条件,使得一名处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实践中的研究者能够去考察这样一个问题。笔者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能为中国考古学找到一些可以利用的学术财富。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这样的财富应该为世界的考古学所共享,这也不失为纪念先师的最佳方法。

二 从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到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1962年宾福德在《美国文物》(*American Anti-*

收稿日期 2014-06-20

作者简介 陈胜前(1972-),男,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学理论、晚更新世史前史、农业起源、石器分析、遗址过程等。

战世佳(1989-),女,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学思想史、旧石器时代考古。

quity)上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一文^[2],通常将其视为过程考古学的主要代表作,也是宾福德个人第一篇有分量的代表作。其实早在1958年威利(Willy, G. R.)与菲利普斯(Phillips, P.)就提出:考古学如果不是人类学,那么就什么都不是^[3]。更早还可以追溯到沃尔特·泰勒(Taylor, W.),他在1940年代就对考古学研究提出严格的批评,考古学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物质材料的形制特征,将考古学的目标仅仅局限于文化历史编年与传播,在他看来这是考古学家偷懒的行为;考古学家应该研究古人的行为,尤其是人类行为与文化演变的规律,为此他提出一个所谓“缀合的方法”(conjunctive approach),强调以遗址为基本研究单位,而非器物^[4]。但是他的基本概念“文化”的含义仍然是博厄斯式的,即文化是一种结构与心理同一性,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文化观^[5]。而宾福德所倡导的考古学研究中文化是功能的,文化是人适应外在世界的除身体之外的基本手段,它比人的体质能力更富有弹性,其变化也就更能反映人类的适应能力。宾福德的文化观不仅是功能的,而且是系统的,它至少可以包括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三个层次,而且不同层次之间是相互关联的^[6]。跟泰勒相比,宾福德不仅具有良好的基本概念基础,还借助系统论的成果,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论体系,即考古学家可以凭借它去研究古人的行为方式。简言之,宾福德所主张的考古学要研究古人的行为;其基本的概念“文化”是功能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要实现的目标也是丰富多彩的人类学。所以,有时以功能主义来称呼过程考古学(功能主义并不限于过程考古学),因为强调研究文化适应演化的过程,最初的“新考古学”变成了“过程考古学”。

对过程考古学最简明的归纳是“更人类学,更科学”^[7]。让考古学走向人类学(更准确地说,是功能主义人类学^[8],而非其他的人类学),离开文化历史考古的分类与描述、历史重建等,转向解释文化演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9]。这个差别或许并不如通常想象的那么大,区别更大的在于后者,让考古学“更科学”。在宾福德讲授的“考古学理论”课程上,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倡导一个科学的考古学,或者说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类似于地质学的科学。宾福德的科学考古学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要点:明确的预设、严格的推理(需要发展科学的方法,假说演绎与检验)、真理(机制、普遍性等)的探索、客观性的保证(材料的客

观性与研究过程的客观性)。

首先是强调明确的预设,科学的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成立不是因为它更正确,而是因为它更便于纠正错误!传统的考古学^[10]最受到诟病的一点就是它的理论前提并不明确。比如广泛应用的文化传播论,文化传播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并没有多少可以质疑的地方,然而,我们无法确定的是文化何以能够传播,为什么有时会传播,有时又不会呢?将之视为当然,或者拒绝解释的“黑箱”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再比如将“考古学文化”视为人类群体^[11],这样的认识并非毫无道理,问题是它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成立,我们可以用它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理论前提的含糊就使得概念非常容易被滥用,就像在旧石器时代运用考古学文化概念一样。理论前提的更新往往意味着学科发展的重要变化。按照传统考古学的理论前提,如果没有新的突破的话,是很难解释“为什么(why)”与“怎么来的(how)”等问题的。科学的考古学反对将预设暗含在材料之中,反对将预设前提设定为不可改变的。

第二,科学的考古学立足于严格的推理。宾福德所倡导的研究方法^[12]经过过程考古学家群体逐渐明确为假说演绎检验的方法^[13]。即从普遍的原理出发,结合特定条件演绎出可以检验的假说,然后通过考古材料进行检验。一般认为,传统考古学更依赖归纳法,但是这种说法只是相对的。人类认知的一般习惯实际上是演绎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任何说服工作的时候,都会从某些道理出发。传统考古学的理论或称预设前提大多是暗含的与模糊的,并非没有。科学的考古学因为将预设明确化,所以演绎的过程也随之明确了。宾福德极其强调考古学家从考古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即从静态的考古材料中获取动态的人类行为信息,这是一个需要经过严格推理的过程,而不应该是想当然的^[14]。

第三,承认推理的可能,承认演绎的方法,就必然要承认真理的存在,虽然真理的存在具有历史相对性(可能代表某个时期的认识)。不承认普遍性、不承认存在真理,那么演绎推理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当代科学最核心的理念之一就是承认人类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可知的规律。科学的考古学因此要去探讨普遍性,要去探索文化适应的机制、文化演化的一般规律等。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机制、普遍性可言。宾福德视人类的能动性是一个恒定的存在,而非否定它

的存在。因为在科学的研究中,难以衡量它,所以暂且将其孤立起来。这是宾福德面对后过程考古学批评时反复强调的。在他运用民族学材料的时候,不是将之作为类比的对象,而是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普遍的原理,然后进行推导的^[15]。

最后,科学的考古学立足于客观性基础之上,没有客观的研究对象与客观的态度,也就没有科学可言。宾福德因此非常注意考古材料的客观性问题,我们研究的考古材料真的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吗?其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从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原理出发,宾福德对学术界普遍相信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如伊萨克(Isaac)的中心营地(base camp)是动物骨骼与石器富集地的认识^[16],再如早期人类的狩猎能力^[17],周口店是否是北京猿人之家等^[18]。宾福德强调发展考古学的“中程理论”的目的应该说是两方面的:一是要完善考古推理的过程,使之更合乎逻辑^[19];二是提高考古材料的可靠性与客观性,使之足以用于假说的检验^[20]。

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过程考古学所强调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与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强调发展过程的研究,都强调统一性与多样性。当然,这种相似性是表面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依托的是功能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它可以解释文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以及变化是如何发生。以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化系统观与进化论,不同因子之间能够相互作用。相比而言,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更强调历史过程的特殊性,因为没有相关文化变化机制作为基础,所以也就很难回答“为什么”与“怎么来的”这样的问题。正因为有机制或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可以依托,过程考古学于是乎可以展开“科学的考古学”研究。“更人类学,更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命题,这是特别值得强调的,没有人类学的理论的支持,科学的考古学是无法推行的。虽然历史学中并不乏理论,但它多是关于历史时期研究,不像人类学研究较简单的社会,跟考古学主要的史前社会能更好地契合。这也许正是过程考古学认为考古学应该归属人类学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宾福德自己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还在密歇根大学当博士生的时候,他就体会到了一味研究考古材料的痛苦,分类、描述、统计,最后还是一头雾水;而当他来到人类学博物馆的时候,便看到了极其鲜活的生活场景^[21]。巨大的反差促使他开始思考传统考古学所存在

的问题以及考古学研究的出路。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人类学孕育了过程考古学。

1985年宾福德访问中国,正式开始接触中国考古学。后来他回忆说,那个时候的中国考古学给他留下的印象更像是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考古学,充满了分类与描述,所有的目的都在于重建历史,而没有去解释为什么会如此。文化的传播就像水波一样^[22],自然而然就会发生,这个过程也不需要解释。毫无疑问,宾福德的批评也只是一己之见。宾福德所批评的传统考古学也并非一无是处,也不是停滞不前的。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史前史的重建仍旧是考古学最核心的任务之一,也是考古学存在的基本理由。经常被称为传统考古学的文化历史考古就是重建史前史的主力军。文化历史考古也并非不重视古人的生活面貌,从最早的沃尔塞(Worsaae, J. J. A.)到集大成的柴尔德(Childe, V. G.),都是如此。其中柴尔德对于史前社会结构的认识也是从生产工具、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的领域的^[23],与宾福德的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三个层次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24]。当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样的相似性,而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差别。宾福德所研究的领域、所关注的问题超出了中国考古学的范畴,也超出了传统考古学的范畴,这也正是其思想革命性之所在。宾福德原来的考虑可能是要革新传统考古学,实际的发展情况则是,他强调研究“为什么”与“怎么来的”问题,改变了考古学研究关注的重心。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会发现宾福德对传统考古学的批评并不都正确,文化历史考古并不可完全取代;同时,我们还会发现科学的考古学本身也有局限性,后过程考古学对此批评良多^[25],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宾福德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所倡导的过程考古学可以丰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内涵,让我们在历史研究之外,可以去尝试另一条道路——更人类学、更科学的道路。

三 从莫斯特难题到中程理论

1968年宾福德从法国的勒阿弗尔坐船回纽约,他之所以没有坐飞机是因为他携带的资料太多了。一年前,他获得资助到法国跟博尔德(Bordes, F.)一起工作一年,研究著名的莫斯特遗址康贝·格林纳尔(Combe Grenal)的材料。这个遗址非常丰富,有多达35个文化层位,田野工作的质量也很高,所有的石器都有三维坐标,博尔德

更是石器分类与研究的大家。按照宾福德自己的说法:

我在法国工作了一年,鉴定了所有的石器、动物骨骼的部位与破裂方式等,并进行了绘图。

接着,整个幻灭的过程开始了……我研究了一个又一个关系——如此之多,以至于我需要一只大铁箱子把这些图表运回美国。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一组莫斯特工具类型的关系、工具和骨骼的关系、骨骼和洞穴深度的关系以及任何你能说得出口的名字的材料类型之间的关系。当然,我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发现的新事实。然而没有哪个新事实能够自己说话,和最初的事实一样。归纳的事实越来越多,发现的分布特征也越来越多。我不过是扩大了问题的范围而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没有哪一组信息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们是那样的:它们只是考古材料中复杂的静态关系。^[26]

考古材料不会自己说话,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需要考古学家想方设法来揭示,分类、统计、描述等方法可以发现考古材料存在的特征(pattern recognition),但是它并不会直接把考古材料所代表的人类行为信息显示出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透物见人”。宾福德深感挫折,五天的海上航程让他有时间重新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思考如何通过静态的考古材料了解古代人类鲜活的生活面貌。当船驶进纽约港的时候,也就是1969年新年前夕,他有了新的想法。这也就是宾福德著名的纽那缪提(Nunamiut)爱斯基摩人的民族考古学研究^[27]。1971年,当宾福德在谢菲尔德考古会议做了精彩的报告,会议的前一天,过程考古学的另一位领军人物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与另外两人拜访宾福德,几乎谈了一个通宵,他们被宾福德在阿拉斯加的研究深深吸引了:考古学研究原来可以如此鲜活生动!

宾福德在阿拉斯加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不仅对于考古学研究影响深远,对他自己后来的研究同样影响巨大。他后来还去澳大利亚与南非进行过类似的研究^[28],为考古学家了解狩猎采集者的遗址结构与遗存特征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参考。所有这些研究其实都是围绕一个考古学核心难题展开的,宾福德称之为“莫斯特难题”。难题的形成始于宾福德对博尔德研究的质疑,博尔德识别出四种不同莫斯特石器组合,并将其中的区别

归因于族群的差异^[29]。而宾福德认为这种差异更可能要归因于狩猎采集者空间利用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来自于不同时间(季节、生命周期等)的利用,也可以来自不同的活动类型(如屠宰、临时营地、狩猎瞭望点等)^[30]。其实考古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狩猎采集者不同季节行为对于考古遗存的影响^[31],但是都没有如宾福德这样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中程研究^[32]。莫斯特难题原来是一个局限于旧石器考古领域的问题,虽然也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旧石器考古存在的基本合理性)。宾福德将之升华为一个考古学的核心问题:即从静态的考古材料如何得到古代人类行为信息,宾福德强调中程研究,它就像桥梁一样把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联系起来。

在不少学者看来,宾福德的具体研究中最有贡献就要数其民族考古学研究^[33],即使不喜欢他的理论立场的学者也同意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相关的论文得到频繁的引用,并被选为当代考古学理论的代表作^[34]。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柳烟与狗尾:狩猎采集栖居系统与考古遗址的形成”《Willow smokes and dog's tails: 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35]。在这篇论文中,宾福德基于他在阿拉斯加的研究,将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区分为两种类型:采食者(forager)与集食者(collector),它们分别对应不同的区域利用方式、遗址类型与遗存组合。长期以来,我们之于狩猎采集者的认识是简单化的,他们就是一群依赖狩猎采集为生简单的社会群体而已。宾福德的区分不仅仅为我们研究遗址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视角,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区分可以为我们研究农业起源过程提供一条重要的线索,农业起源必定产生于运用集食者的狩猎采集社会中^[36]。我们不难发现,宾福德的这种研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民族学的类比:某个民族如何,所以考古材料可能也如此。他是从中提炼出了原理或普遍性的认识,然后运用它来分析考古材料,他在后来的研究中还不断运用这种方法^[37]。

如何从考古材料中得到人类行为的信息,于中国考古学而言是一个极其关键又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考古学的“透物见人”问题。20世纪50年代年轻一代的中国考古学家就已经注意到当时考古学研究的不足,形制、年代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古代社会人类活动的研究;但是八九十年代他们又反思当时的鲁莽^[38]。中国考古学一直没有找到“透物见

人”的桥梁,从高层理论到考古材料之间巨大的鸿沟也无法填平^[39]。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或说稍早,美国考古学也有类似的反应。首先是泰勒对传统考古学的激烈批评^[40],但是他并没有提出真正有效的理论与方法工具。60年代宾福德倡导新的考古学研究方式时,此时他得到一个日益扩大的群体的帮助。刚开始时,他们所走的道路跟泰勒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希望运用新的工具比如统计学的方法,从考古材料中提取有关人类行为的信息。但是很快他们也遇到了问题,考古材料并不会自己说话,考古学家需要一个桥梁工具,也就是中程理论,实现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跨越。上面所说的宾福德的阿拉斯加之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他与同道一起开展了大量狩猎采集者居址组织结构特点的研究^[41],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样属于过程考古学领军人物的希弗(Schiffer, M.B.)^[42]与拉斯杰(Rathje, W.L.)^[43]则将相关研究拓展到当代社会中。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这是一个我们特别值得学习的环节。由于中国没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历史,我们不曾积累丰富的民族学材料并且能够在全世界开展相关的田野工作。不过,我们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学习它。

四 从动物骨骼研究到人类行为理解

在阿拉斯加(1960、1971-1972年)与澳大利亚(1974年)开展民族考古学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程研究之后,宾福德开始转向从动物骨骼研究出发的遗址形成过程研究。1981年出版《骨骼:远古之人与现代之谜》(*Bones: Ancient Men and Modern Myths*)^[44],他着重进一步发展中程理论,建立动物骨骼遗存形态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联,其中包括区分人与动物改造骨骼的特征,以及识别人与动物行为所导致动物骨骼组合的差异。他继续采取他的行动主义研究(actualistic studies)立场,切实地观察动物行为对骨骼的收集与改造,1981年他到南非进行野外工作,一方面研究动物行为与骨骼埋藏学,另一方面研究博物馆的材料。1984年出版《克拉希斯河口的动物遗存》(*Faunal Remains from Klasies River Mouth*)^[45],其后还与人合作发表专门研究鬣狗行为与动物骨骼遗存之间关系的文章^[46]。

不难看出,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具有典型的科学方法特征,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科学实验,他努力从中发现原理性的认识。首先排除动物,

尤其是食腐动物对动物骨骼的影响;次之,建立人类狩猎采集者所导致动物遗存的独特形态;然后,基于这些原理性的认识,他进一步推断早期人类的狩猎行为。跟许多对人类能力充满乐观的研究者不一样,宾福德提出人类可能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发展出真正的文化适应,此前只能说是有关工具帮助、但主要依赖身体的适应^[47]。宾福德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动物啃咬对骨骼保存的影响,如养狗的纳瓦约(Navajo)印第安人营地就很少羊羔的骨骼^[48]。他还注意到考古学家经常把人类遗址的动物骨骼都归因于人类的狩猎(这在中国考古学中是十分普遍的认识),但是这样的认识并不正确!考古学家基于这样的材料得出结论是不可靠的,比如说路易斯·利基(Leakey, L.S.B.)在奥杜威刚开始只发掘到小型动物,于是提出早期人类狩猎能力弱,只能狩猎小型动物的结论;后来利基得到更多的资助,发掘面积更大,接着发现了大象、长颈鹿等大型动物,解释无法自圆其说了。

考古材料不会自己说话,考古学家需要使其说话;但是,如果考古学家不理解考古材料的“话语”,同样不会知道它在说什么,宾福德所倡导的中程研究就是要去理解这种话语结构。1985年宾福德访问中国,研究周口店遗址的材料,并考察了正在发掘的阎家岗遗址。其后他发表论文^[49],加入到有关周口店的争论中,中国考古学界借此了解到宾福德的研究视角。周口店是很早就成为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与文化遗存发现之前,全世界还没有如此丰富的发现。关于石器的人工属性、骨器存在与否、人工用火、动物骨骼的来源、以及人类的暴力倾向等方面争论非常激烈。裴文中先生通过实验与细致观察确定了石英石器的人工性质。就其他几个方面,宾福德都提出了质疑,观点细节这里就不讨论了。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宾福德会得出这些结论,为什么他不赞同中国考古学家普遍相信的观点,比如说周口店是“北京猿人之家”的说法,因为他深谙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依赖这种生计方式的人群是高度流动的,人们不可能久居一地,他们更经常的做法是让人去就食物,而不是像定居社会一样让食物来就人。人类可能多次利用过周口店遗址,但并没有长期居留。与之相应的问题,那就是动物骨骼的来源,3000多头鹿被认为是北京人狩猎的结果^[50],动物化石组合中还包括豹、洞熊、剑齿虎、鬣狗、大象、犀牛、骆驼、水牛、野猪与

马,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狩猎的么?

早在1981年宾福德就开始怀疑这一点,他认为人类可能不是动物骨骼堆积的主要原因,那么什么因素导致洞穴内动物骨骼堆积呢?哪些材料跟人类行为相关呢?这些人类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宾福德研究过鬣狗、狼等动物收集骨骼的材料,对动物与人所导致的骨骼形态特征与组合特征有详细的研究^[51]。正是基于此,他不仅可以质疑周口店导致动物骨骼堆积的人类原因,而是更近似于鬣狗窝;他还进而推翻了魏敦瑞(Weidenreich, F.)所认为的北京猿人同类相食的观点^[52]。他认为北京猿人可能还不能进行有效狩猎,而是以尸食(scavenging)为主,是一种以工具为辅助的(tool-aided)、以体质生存为主要手段的猿人。总结宾福德的方法,他基本上从已知推向未知。其实,其他考古学家包括中国考古学家在内,也都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差别在于宾福德所依赖的“已知”是通过民族考古学研究、动物行为学观察、实验考古分析、确定的人类与食肉类导致骨骼堆积的对比等途径获得的,而不是研究者基于自身常识的判断(通常并不先明确地提出来),利用这些已知的信息,他可以就骨骼遗存形成过程得到一些“原理性”的认识,然后去分析具体的考古材料。这些原理性的认识就是理论前提,也就是过程考古学所强调的明确的预设(assumption),而不是将它们暗藏在材料中,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考古学中关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远还没有解决,20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加以关注^[53],可惜后来没有持续的研究。访问阎家岗遗址之后,宾福德在与笔者的讨论中提出,动物骨骼的表面特征与组合构成表明这里受到食肉类动物的影响,骨骼堆积不大可能为建筑材料。与欧洲同时期典型的利用动物骨骼所建筑的居所相比,差异甚大^[54]。对于笔者曾经引用大连古龙山遗址,将之视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宾福德提出质疑与批评,这个遗址仅有数件人工痕迹不是很清晰的石器,但动物骨骼材料极为丰富,有77个物种,仅马牙就有超过7000枚,至少代表200个个体^[55]。如此庞大多样的动物遗存,这意味着人类是长期利用该遗址的,然而人类遗存如此之少,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如果了解人类狩猎采集者的行为方式、遗址组织方式,同时了解动物尤其是食肉类的影

响,那么就不会简单地将古龙山这样的遗存归因于人类的狩猎,也不会划分出如此之多的骨制品。类似的问题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并不

鲜见,我们也许不能完全肯定宾福德的研究结论,但是他的质疑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否则考古学研究就是沙上建塔。

五 从狩猎采集者研究到农业起源理论的创立

1989年宾福德从新墨西哥大学转到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直至退休。这期间他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利用民族志材料来研究农业起源问题。他原计划用四年时间完成研究,结果耗时近十年(1998年完成)。2001年出版《构建参照框架:用民族志和环境资料构建考古学理论的分析方法》(*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Ethn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56]。这本厚近600页的巨著,最精华之处就在于它不依赖考古材料,而是从已知的民族志材料与现代环境材料(气象站材料)出发,构建起一个人类文化适应变迁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不是从考古材料中归纳出来的,而是研究者基于现代材料的理论构建,它可以通过考古材料研究来修正,同时,它也有助于我们去发现与研究考古材料。

1968年宾福德发表“后更新世的适应”(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的论文,提出他的农业边缘区起源理论^[57]。认为柴尔德、布雷德伍德(Braidwood)关于农业起源地带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农业首先产生的地方既非柴尔德所认为的河谷绿洲,也非布雷德伍德所认为的山麓地区,而是一些边缘地带。他认为生活于山麓这类最佳地带的狩猎采集者,能够在自然资源供给与人口增长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可能会为环境恶化、人口增长所打破,比如一个群体的人侵入到另一群体的领地中。平衡被打破的狩猎采集者群体可能分裂,部分人口迁出最佳地带,移居到一些边缘环境中,这样的话,最佳地带就始终能够处在环境承载力之下。而移居边缘地带的狩猎采集群体,很容易构成对食物资源的压力,这种不平衡最终将导致人们强化利用某些具有潜力的物种,动植物驯化随之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宾福德建立边缘区起源理论的基础并不是考古材料,当然,柴尔德与布雷德伍德的理论也不是立足于考古材料的基础上,都是基于某些普遍性认识基础上的理论推导^[58]。宾福德所依赖的普遍性认识就是狩猎采集者研究,或称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依赖这种生计的人口数量受制于自然资源的供给,当狩猎采集者面临生计压力

(无论来自人口增长还是环境恶化),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没有畜力与复杂的工具),就必定要扩大食谱与/或强化利用某些资源(intensification)。

宾福德曾经长期以“后更新世的适应”为题开设研究生课程,系统阐释他的农业起源理论。他从文化系统变迁的角度讨论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狩猎采集者文化反映的多样性。90年代末当笔者开始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他开始应用复杂系统理论^[59]来解释农业的起源,农业作为文化系统处在临界状态下涌现出来的新特征,人类新的生态位形成。与之相应的是,宾福德还长期开设“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s)的研究生课程,在此过程中,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民族志中的狩猎采集者的资料。这就为他90年代展开从狩猎采集者的角度研究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材料保证。毫无疑问,民族志中狩猎采集者材料是零散的,另外,一个困难是环境资料的处理。宾福德希望利用环境资料建立狩猎采集的模型,而当时相关的电脑软件比较少,需要自己编写与测试,为此他花费的时间大大超过了预期。《构建参考的框架》一书将“能量”作为不同生态系统的“通货”(currency),从而实现不同生态地带的比较;另外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人口”,人口密度是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中可以量化的重要指标。结合全球395个狩猎采集者群体的研究,他进而确立了农业起源与其他文化适应方式形成的基本理论。

正是在宾福德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笔者展开了中国农业起源过程的研究,最后形成《史前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起源过程的文化生态考察》一书^[60]。长期以来,中国农业起源研究主要关注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如陶器、磨制石器、定居聚落、驯化动植物特征的发现,而很少关注中国农业起源的机制问题,无法回答“why”与“how”,即农业为什么会起源,为什么又不起源,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可以分成哪些模式、哪几个阶段等问题,笔者的研究试图弥补这样的缺憾。同时,中国考古学研究也非常忽视非农业起源中心区文化适应的多样性问题,笔者的研究回答了非农业起源核心区在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这个关键时期内文化适应方式的多样变化,每个文化生态区实际上都有基于当地条件的适应策略。再者,需要指出的是,拙著之于统一性与多样性研究的立足点都是狩猎采集者的文化适应机制。农业起源问题的实质就是狩猎采集者放弃了流动采食的方

式,转向了定居的农业生产,所以农业起源研究必须侧重于狩猎采集者文化适应机制的剖析。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视角是本书最重要的角度,也是理解本研究的关键。也正因为从狩猎采集者的研究出发,所以研究农业起源需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农业起源的根源发生于旧石器时代,要追溯农业起源的过程都必须回到旧石器时代研究中。因此,拙著的研究主要是从旧石器时代出发的,跟当前中国农业起源研究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有所不同。因为有理论基础可以利用,我可以推导文化适应变迁在石器组合与遗址组织上的变化,使之成为农业起源研究新的信息来源。从理论研究出发,基于现代环境资料的狩猎采集者模拟研究得出模型^[61]与考古材料相对比,出现令人惊奇的巧合^[62]。这反过来也证明了宾福德所发展出来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强大的说服力。

六 总结:贯穿考古学研究的科学与人类学的方法

上文按照时间线索追溯了宾福德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历程,并将之归纳为若干个重要的问题,同时,反思这些问题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从当代中国考古学的视角来审视宾福德学术遗产。当然,宾福德学术思想发展是主干,我们希望能够把握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另外,希望能让他的学术遗产为中国考古学所分享。一方面,通过运用“他者的视角”,我们或许能够站在西方考古学之外,更清晰看到某些特点;另一方面,作为他的学生,本文同时希望贡献一些难以在一般学术研究中得到反映的切身观察与体会。

宾福德终生研究不辍,著作等身。又鉴于他严格的强调科学逻辑的语言风格,使得理解他的研究相对困难。过去十五年里,笔者之一曾有幸亲炙宾福德的教诲,后又重温他的经典之作,试图对他的学术思想贡献做一点归纳。简言之,贯穿在宾福德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线索就是:发展科学的考古学,发展人类学的考古学。他的方法也是围绕这条线索展开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他运用民族志的研究,包括行动主义的野外调查以及系统的狩猎采集者民族志材料的分析,去了解史前狩猎采集者遗址的结构、组织以及所涉及的人类行为方式。

目前中国考古学对于宾福德的了解还比较片面,尚不能有效地把握他的学术精髓。显然,没有学者是万能的,每位学者都有其时代与个人的

局限性,作为后来人,我们需要的是学习前人的长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而非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前人,以获得心理的满足。就宾福德的研究而言,他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代考古学还没有解决,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实践中更是如此。因此,我们这个简单的归纳也就有了一星半点的现实意义。

- [1] Binford, L. R., Sabloff, P. L. W. *Conversations with Lew Binford: Drafting the New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8.
- [2][6] Binford, L. R.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28: 217-225, 1962.
- [3] Willy, G. R., Phillips, P. *Method and Theory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8, pp.1-7.
- [4][40] Taylor, W. *A Study of Archaeology*.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69, 1948.
- [5][加拿大]布鲁斯·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9~282页。
- [7] Johnson M. *Arch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Oxford, 1999. 中文译本参见[英]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考古学理论导论》,岳麓书社2005年,第34页。
- [8]很有意思的是,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代表功能主义的人类学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传到美国,此时两人都曾在美国大学里任教。实际上,过程考古学兴起的时候,人类学已经发生转型,但是过程考古学接受的是更早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而非同一时期更人本的人类学。
- [9] Willey, G. R. Sabloff, J. A.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2nd*, W.H.Freeman, San Francisco, 1980, pp.181-210.
- [10]所谓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称呼,它大体指过程考古学出现的西方考古学,以及采用类似方法的其他地区考古学;有时又称之为“文化历史考古”,但是文化历史考古后来还有发展,并不能完全被“传统考古学”一词所概括,两者的区别是需要注意的。
- [11][美]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2013年,第192页。
- [12] Binford, L. R. Archaeological systematics and the study of cultural process. *American Antiquity* 31: 203-210, 1965.
- [13] Fritz and Plog, The nature of archaeological explanation. *American Antiquity* 35: 405-412, 1970.
- [14][26][48] Binford, L. R. *In Pursuit of the Past: Decod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With a New Afterw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2 p.100, p.55; [美]路易斯·宾福德著、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86,36,37页。
- [15] Binford, L. R. Smudge pits and hide smoking: the use of analogy in archaeological Reasoning. *American Antiquity* 32: 1-12, 1967.
- [16] Isaac, G. The diet of early man: aspects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Lower and Middle Pleistocene sites in Africa, *World Archaeology* 2: 278-299, 1971.
- [17] Binford, L. R. The hunting hypothesis, archaeological methods, and the past.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30(s8): 1-9, 1987.
- [18][47][49] Binford, L. R., Ho C. Taphonomy at a distance: Zhoukoudian, “The cave home of Beijing Man”, *Current Anthropology* 26: 413-442, 1985; Binford, L. R., Stone, N. Zhoukoudian: A closer look, *Current Anthropology* 27:453-475, 1986.
- [19] Binford, L. R. *Working at 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83, pp.213-227.
- [20] Binford, L. R. Objectivity-explanation-archaeology-1981. In: *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Archaeology*, edited by C. Renfrew, M. J. Rowlands, B. A. Segraves, Academic Press, 1982, pp.125-138.
- [21] Renfrew, C. An interview with Binford. *Current Anthropology* 28: 683-694, 1987. [美]路易斯·宾福德、[英]科林·伦福儒著,陈胜前译:《路易斯·宾福德访谈》,《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 [22] Binford, L. R. A conside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design, *American Antiquity* 29: 425-441, 1964.
- [23] Childe, V. G. *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56.
- [24]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89-92页。
- [25] 陈胜前:《理解后过程考古学:考古学的人文转向》,《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 [27] Binford, L. R. *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8.
- [28] Binford, L. R. An Alyawara day: flour, spinifex gum and shifting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0: 157-182, 1984.
- [29] Bordes, F. and D. de Sonneville-Bordes,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ability in Paleolithic assemblages. *World Archaeology* 2(1): 61-73, 1970.
- [30] Binford, L. R. Interassemblage variability - the Mousterian and the “functional” argument. In: *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C. Renfrew, pp.227-254. Duck-

- worth, London. 1973.
- [31] Thomson, D. F. The seasonal factor in human culture.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10: 209–221, 1939.
- [32][44][51] Binford, L. R. *Bones: Ancient Men and Modern Myths*,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81.
- [33][英]科林·伦福儒著、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5~220页。
- [34] Preucel, R., Hodder, I. eds.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in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6.
- [35] Binford, L. R. Willow smoke and dog's tails: 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 *American Antiquity* 45:4–20, 1980.
- [36][60] 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起源过程的文化生态考察》,科学出版社2013年。
- [37][56] Binford, L. R.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Hunter-Gatherer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1.
- [38] 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7页。
- [39] 陈胜前:《考古学的透物见人问题》,待刊。
- [41] 如 Binford, L. R. Organization and formation processes: looking at curated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35: 255–273, 1979; Dimensional analysis of behavior and site structure: learning from an Eskimo hunting stand. *American Antiquity* 43: 330–361, 1978; Archaeology of plac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5–31, 1982.
- [42] Schiffer, M. B. *Behavioral Archaeology: First Principles*.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Salt Lake City. 1995.
- [43] Rathje, W. L. The Garbage Project: a new way of looking at the problems of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27: 36–241, 1974.
- [45] Binford, L. R. *Faunal Remains from Klasies River Mouth*,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84.
- [46] Binford, L. R., Mills, M. G. L., Stone, N. M. Hyena scavenging behavio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unal assemblages from FLK 22 (the Zinj floor) at Olduvai Gor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7: 99–135, 1988.
- [50] Wu, R., Lin, S. Peking man. *Scientific American* 248 (6): 86–94, 1983.
- [52] Weidenreich, F. The mandibles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 comparative study. *Paleontologia Sinica, new series D*: 56, 1936.
- [53] 尤玉柱:《史前考古埋藏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89年。
- [54] 魏屹、陈胜前、高星:《试论阎家岗遗址动物骨骼圈状堆积的性质》,《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31卷第3期。
- [55] 周信学、孙玉峰、王志彦等:《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 [57] Binford, L. R. 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 In S. Binford and L. Binford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Aldine, Chicago, 1968, pp. 313–341.
- [58] Watson, P. J. Explaining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In *Last Hunters First Farmers*, edited by T. D. Price and A. B. Gebauer, SAR Press, Santa Fe, 1995 pp. 21–38.
- [59] Bak, P. *How Nature Works*,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1996. [丹麦]帕·巴克著,李炜、蔡劭译:《大自然如何工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61] 陈胜前:《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25卷第1期。
- [62] 陈胜前:《中国晚更新世一早全新世过渡期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迁》,《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25卷第3期。

(责任编辑、校对:黄苑)

Binford's Intellectual Legacy: A Perspective from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aeology

CHEN Sheng-qian; ZHAN Shi-jia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The American archaeologist Lewis R. Binford, known as the founder of the “New Archaeology” (later called “processual archaeology”), is no doubt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archaeolog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re component that went through Binford's entire intellectual career is his advocacy for archaeology to be more scientific and more anthropological, which has also shaped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example, he adopted ethno-archaeological approach, including fieldwork and data analysis, to study hunter-gatherer sites concerning their structures, organization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Key words: Binford; intellectual history; Chinese archaeology; processual archaeology/